

## 论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的精神关系<sup>〔\*〕</sup>

——兼与史记先生商榷

○ 杜璇<sup>1</sup>, 周中明<sup>2</sup>

(1.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46;

2. 安徽大学 文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史记先生等文学评论家普遍认为以《女神》为代表的郭沫若的诗歌是在惠特曼诗歌精神的影响下创作而成,因此郭沫若被称为“中国的惠特曼”。但是,若仔细审视郭沫若的作品,发现他只是侧重于鉴赏和吸收到惠特曼平民观、城市观、灵肉一致的爱情观的表面特征,惠特曼诗歌平民观背后的泛神论、城市观背后的仁爱论、“灵肉一致”的爱情观背后的对国民的深层价值秩序结构改正的意义没有被郭沫若深入地体悟。郭沫若偏重于在本土语境的视阈下把惠特曼的诗歌精神和中国的现实相结合,以及借鉴惠特曼的诗风来扩展了诗歌话语资源,开拓了诗学视野,丰富了文学想象的审美环境和诗情空间,而不是侧重理解其形而上的哲学特征,这方面则被史记先生和其他学者所忽视。

〔关键词〕郭沫若;惠特曼;平民观;城市观;爱情观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7.03.013

长期以来,史记先生在《论“五四”时期惠特曼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认为郭沫若在五四时期创作的诗歌受到了惠特曼诗歌精神的影响,<sup>〔1〕</sup>这个观点不仅有《凤凰涅槃》《天狗》《地球,我的母亲》等具有明显模仿惠特曼诗歌文本的支持,更有郭沫若本人对惠特曼诗歌精神的理论研究作为支撑。但是,仔细考察郭沫若受惠特曼诗歌精神影响下的诗歌创作,会发现郭沫若只是借鉴惠特曼诗歌的一些外部特征。

作者简介:杜璇,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周中明,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学。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人性话语与二十世纪文学”(12JJD7500192)的阶段性成果。

## 一、郭沫若诗歌与惠特曼诗歌平民观的差异

史记先生在《论“五四”时期惠特曼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中认为,在惠特曼平民精神的启发下,郭沫若创作出《炉中煤》《巨炮的教训》等一系列具有平民精神的诗篇,平民精神可以说是郭沫若诗歌创作的一大名片,但是若仔细审视郭沫若的这些诗歌会发现,他只是偏重借鉴惠特曼平民精神的抒写方法,没有侧重借鉴惠特曼平民精神的内核。

惠特曼对泛神论情有独钟,他认为上帝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精神存在,因此世界上不管是庞然大物,还是微小颗粒,抑或是平民,都是上帝的巨大价值的体现,从而从外到内都散发出崇高典雅的神圣性。神不仅仅是超越于自然界的神,还可以是内化于自然界和内化于人内心的神,即人和自然都是“超灵”的显现,杜彬彬在《惠特曼泛神论自然观蕴含的意义》一文中称惠特曼泛神论的哲学观念受到斯宾诺莎的影响,杜先生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他忽视了惠特曼对斯宾诺莎泛神论的改造。笔者认为,杜彬彬也没有指出斯宾诺莎和惠特曼泛神论的区别。斯宾诺莎出于对传统神性的反抗,认为虽然一切事物都是神的一部分,但是神是静止的,斯宾诺莎没有赋予肉体和精神以跃动不羁的属性,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在斯宾诺莎那里,一切事物都受着一种绝对的逻辑必然性的支配。在精神领域中既没有所谓的自由意志,在物质界也没有什么偶然。凡发生的事俱是神的不可思议的本性的显现,所以各种事物照逻辑讲究不可能异于现实状况。”<sup>[2]</sup>斯宾诺莎强烈反对人在观察世界时投入热情和激情,因为他认为激情会蒙蔽人的认知力、感悟力和理解力。但是惠特曼抛弃了斯宾诺莎泛神论的部分解释,惠特曼肯定人们观察和打量万物的激情,并把主观能动性无限夸大,他主张用坚忍不拔、激进昂扬的精神和活力探索和挖掘现实生活。惠特曼还植入了“力”的性质强调平民无限蓬勃的创造精神,从而使平民主体超越斯宾诺莎泛神论中的伦理内涵而具有全新的意义,这一命题契合并反映了美国建设时期反抗和抵制英国殖民奴役的时代精神。平民在惠特曼的诗歌中具备如下特征:

第一,平民具有神性,能平等地看待万物,平民是有智慧的存在,时刻都能体会到神性存在的光辉,诗人表达“我在每一件事物当中都听见和看见了上帝/我在二十四小时的每一小时甚至每一瞬间,都看见了上帝的一部分,/在男人和女人的脸上,在镜子里面的我自己的脸上,我看见上帝/在大街上我得到上帝掷下的书信,每一封书信都有上帝的签名”。<sup>[3]</sup>在惠特曼的诗中,在大自然中快乐工作的黑奴、辛勤垦荒的美国青年、卖力淬火的铁匠和怡然自得、潇洒酗酒的同寝人等等,美国人都能在大自然中沐浴神性,从而得到人性舒展和灵魂自由。神性的灵光向着自我、社会、欲望、道德等诸多社会层面闪耀,使人们在因神性的植入体现出血肉丰盈的表情。李野光在《惠特曼研究》中发现惠特曼是性善论者,他相信从人类到宇宙,都在永远地补救自己的缺陷,不断地向至善至美方向发展。<sup>[4]</sup>笔者认为这种观念是正确的,诗人以泛神的诗性思维启发人们在面临困

窘的生活时把自己的生存压力转换为价值期待,由此体现他的诗歌在对精神的提升、对灵魂的改造、对人格的塑造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体现出诗人感性中含有理性、理性中包孕感性的诗歌创作智慧。

第二,生活在充满民主气息的社会环境中平民不是将自己的行为准则纳入到传统道德规范系统中,他们在美国现代社会有着一定的文化涵养和精神诉求,即使生活在艰苦贫瘠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中,他们大多数精神依然兴奋高昂,并用自己蓬勃的精神抵抗难以承受的苦难,身体和精神因受民主精神的滋润得到前所未有的舒展。尤其是抒情主人公“我”不肯过着苟且偷生、庸庸碌碌的琐屑生活,具有强烈神性意识的诗人力图以“我”为主体的重塑和情感意志的完善来影响民众,以“人即是神”的抒情冲动表明自己和其他美国民众一起超脱物欲化、功利化、工具化的世俗社会,他以自己是神性社会中的精神标杆来号召民众不向逼仄的生活低下高贵的头颅,启发民众在追求庸俗忙碌人生之外对灵的守望和超脱,所以他的诗歌努力表达的不是平凡世界中平凡人的无助、无奈和无能,而更多的是民众因具有神性产生的快乐惬意的心态和精神,即使优胜劣汰的社会竞争法则迫使底层民众深陷触目惊心的生存绝境,在高贵的人格神的指引下,人们依然能对外界异化力量进行不屈不挠、不折不扣的抵御和抗争,由此获得了沁入心扉的精神支柱。

第三,惠特曼笔下这些平民心中都有坚定的信仰。这与基督教倡导的伦理道德观紧密相连,平民即使暂时陷入了无奈的处境,认为自己的痛苦而又荒谬的人生是由超验的彼岸世界演绎而来,之所以陷入了无奈的境地,盖因生活中含混复杂的事实和超验的理性世界之间产生了隔阂。尽管有时平民陷入困境,但他们仍然苦苦寻觅着心中的、那能够带领人们走向怡然澄澈境界的无形的上帝。所以无论是策马奔腾的放牧人还是挥动大锤挥汗如雨的打铁匠,无论是在茂密森林里干活的自信满满的伐木人还是划着长桨沿着罗伦斯河而下的筏夫,他们都认为:除了人类社会这个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神圣的、由上帝主宰的彼岸世界。这种上帝与人、灵与肉、世俗和信仰、理想和实际、有限和无限、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价值的张力结构,决定着要有一个超验世界来救赎和确证自我、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存在。比如在《自己之歌》中,作者这样写道: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包括上帝在内,比他自己更重大,  
任何一个行业,青年人都可以借之成为一个英雄,  
任何一件柔软的物质都可以成为旋转着的宇宙的中心,  
我对任何男人和女人说:让你的灵魂冷静而镇定地站在百万个宇宙之前。

——《自己之歌》<sup>[5]</sup>

这首诗在惠特曼作品中是有代表性的,歌颂平民不是他的主要目的,他只是借平民的形象来表现形而上的精神信仰,信仰才是他这类诗歌的创作目的,诗歌中的平民普遍相信,有了坚定的信仰,人们即使在政治强权和文化强势的境遇下,始终都能树立对个体自由的渴望和思想独立的信念;有了信仰,即使人们处

在四分五裂的独立战争的险境中,也能坦荡相处,以诚相待,宁愿自己受苦受难,而不愿对别人拳脚相加;有了信仰,人们即使在颠倒黑白、恐怖压抑、消极颓废、怪诞疯狂的窘境中,也能营造出一个静谧的心灵世界。因此压抑自己潜意识中的邪恶苗头,实现心灵和道德的陶冶和提升。所以,诗人浓墨重彩地凸显美国民众在艰苦卓绝的恶劣环境中不放弃自己的原初理念和精神信念,以及他们凭借超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达到自己拥护民主制度和宣传民主精神的人生目的。

郭沫若虽然也描写从事各种职业的健壮朴实处于社会底层的最艰苦的劳动人民,诗人也深情赞美他们,他认为他们不仅有强壮有力的臂膀、灵活发达的头脑、健康结实的身体,而且幸福满足地过着自强自立、自尊自主的生活。而郭沫若在理解的时候,没有侧重领悟惠特曼诗歌中平民更为本质的神性和对心中对超验世界的守望。

一个锄地的老人/脱去了上身的棉衣/挂在一旁嫩桑的枝上/…/他那健康的黄脸/他那斑白的须髯/他那筋脉隆起的全手。/我想去跪在他的面前/叫他一声:我的爹/把他脚上的黄泥舔个干净。

——《雷峰塔下》<sup>〔6〕</sup>

在《雷峰塔下》等诗歌中,郭沫若把工人农民等平民看成伟大的普罗米修斯,把自己称为地球母亲的不孝子孙。抒情主人公有时甚至想跪倒在农民脚下,称他们为亲爱的父亲,并想为他们服务,舔掉他脚上沾满的黄泥,通过自己内心的接受和由衷地臣服,诗人赋予劳动者高尚的劳动品格。表面看来惠特曼的诗歌和郭沫若的没有二致,都是对平民的赞颂,但前者的平民是以形而上的神性和信仰做基础,而郭沫若只是侧重于学到他对平民行动的铺排列举的抒情风格,没有吸收他的形而上的信仰,《地球,我的母亲》《上海的清晨》《雷峰塔下》等诗歌便是如此。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信仰和实用是一样的,认识 and 实际是一致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是雷同的,他们充分重视现实的人生,体现一种入世的实践理性的精神。所以国人大多关注自然活动而不注重神圣活动、注重平民身体的高贵而不注重灵魂的高洁、注重生命的皈依而不注重灵魂的驻存。郭沫若在理解惠特曼诗歌的时候,没有偏重与理解惠特曼憧憬的超验世界,而极其注重对现世的、世俗性的生命活动的领悟。

体现平民观的郭沫若的诗歌大多以平民为主角,表现抒情主人公和劳动人民完全融合在一起,并发现平民身上崇高的品质,分享他们喜怒哀乐的场景。他对信仰所具有的非现实的神秘性持质疑的态度,没有偏重注意到惠特曼的呼唤神秘的、灵魂体悟式的抒情诗歌,也没有偏重理解惠特曼用神性的眼光观照和打量平民,希望用博爱、宽容和奉献牺牲的精神打造平民的思想,亦没有偏重理解惠特曼用信仰和情感凝聚人心,提升国民精神境界的积极意义。所以郭沫若诗中的平民普遍没有信仰的思想体系和坚定的精神信念作为自己的心灵寄寓、精神支柱、文化遗产的纽带,所以也就不可能始终对上帝的回归心怀焦虑和祈盼。郭沫若曾经这样理解终极信仰,“形而上学者假拟出一个无始无终的本体,宗教

家虚构出一个全能全智的上帝,从而宗仰之,冥合之,以图既失了的乐园之恢复;但是怀疑尽了头的人,这种不兑换的纸币,终究要失掉它的效力。”<sup>[7]</sup>

## 二、郭沫若诗歌与惠特曼诗歌城市观的区别

惠特曼对城市生活给人们带来的丰富性、深刻性、多维性、复杂性有着独特到位的把握,他不仅敏锐地察觉到城市中的大发展促使人们日常生活方式和社会活动发生沧海桑田般的变化,还能加快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进程和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更新。在国民精神普遍匮乏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潜在于个体内部的爱心、凝聚力、创造力不经过其他人的悉心引导和提示或者不受外在力量的激活非常容易被人们忽视,尤其是从英国殖民权力场域的束缚和控制下刚刚获得独立的美国,个体潜能完全处于被蒙蔽、被淹没、被封锁的状态。所以需要在城市精神的引导下培育出进步的理性观念,尤其对城市中科技的洗礼来鼓起他们奋发向上的勇气和毅力,强化和升华他们追求民族强大和繁荣的凝聚力。所以,他把启蒙理念寄托于通过对城市文明精神的推崇上,他呼吁民众应多植入崇尚城市中的科技理想的观念,鼓舞美国人的生命热望,激发人们对英国文化殖民的控诉和对抗,以彻底根除民众依赖英国陈旧的精神文化的习惯和驱除民众受奴役麻痹的风气的蔓延,使之对美国当前和未来多负责任,产生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实现重造现代国家的迫切念想。惠特曼将激情、仁爱和城市进步等融合起来,并最终指向了人的创造性和社会的进步,使其理性观点到达了较深的哲学层面。惠特曼在《草叶集》序言中写道:“精密科学对于诗人不是束缚而往往是鼓励和支持,那里是出发和永远令人回想之处。”<sup>[8]</sup>

对现代科学精神的推崇起源于诗人感受到长期处于殖民压抑的民族在苏醒后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是远远落后于先进国家,若能受到城市文明的洗礼和科学精神的浸染,人们就可能对社会发展做出清醒的判断和理性的认知,现代化的美国梦会早日实现,惠特曼始终强调城市发展在社会进步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他在“钢铁时代”的纽约纵情歌唱,歌唱火车头、电缆和脱粒机。<sup>[9]</sup>

在《从巴门诺克开始》《斧头之歌》《展览会之歌》《红树木之歌》《给冬天的一个火车头》中,惠特曼对城市文明大为赞赏,他大力歌颂辞典编纂家、机械师、化学家、生物学家、地质学家、数学家对推动城市发展的丰功伟绩。表现在美国工业化浪潮的推动下,钢铁化工冶炼、石油能源开采、肉食加工生产等大型工业的大量出现推动了美国的伐木造纸、纺织产业、酿酒行业、建筑工程等各行各业的振兴。

惠特曼在《狂欢的城市》这样书写心中理想的被科技包围的城市:

狂欢的、可以到处走动和作乐的城市,

总有一天,由于我在你当中经历过和歌唱过,因而会使你显赫起来的城市,

不是你的那些庆典,你那时时变换的场面,你的壮观,在报偿我,

不是你那些栉比连绵的房屋,或码头上的船只,

也不是大街上的人流,或者辉煌的陈列商品的橱窗,  
 也不是跟学者们交谈,或参加社交和宴会;  
 不是那些,而是当我经过你的时候,曼哈顿哟,你那频繁而迅速地向我  
 传递的爱的眼色。  
 传递着对我自己的眼色的响应——是这些在回报我,  
 只有相爱者们,长久的相爱者们,在回报我。<sup>[10]</sup>

“我们对自己说,记住,不要害怕,要坦白,敞开身体和灵魂,呆一会又继续前进,要大方,温和,纯洁,使人亲近。”<sup>[11]</sup>在《欢乐之歌》中,主人公的精神是如此的欢乐,以至于“它是无拘无束的——它如同闪雷般飞射。司机的快乐啊!他和一辆火车头一起前进。”<sup>[12]</sup>这些诗在惠特曼的作品中是具有代表性的,在坚信城市生活可以丰富美国人的心理空间、可以对美国进行文化重建时,诗人凸显城市的进步带给主人公的“爱的眼色”、爱的喜悦兴奋和欢愉惬意。惠特曼认为城市中蕴含着无穷的爱的潜力和能量,使得城市中生活的人们同样可以保持天真的品性,淳朴的天性和青春的诗意,正如阿伦布洛克强调个体价值和个体尊严时概况总结出人文主义者的最大特点,“每个人在他或她自己的身上都是有价值的,我们仍用文艺复兴时期的话,叫做人的尊严,其他一切价值的根源和人权的根源就是对此的尊重,这一尊重的基础是人的潜在能力,而且只有人才有这种潜在能力:那就是创造和交往的能力(语言、艺术、科学、制度),观察自己,进行推测、想像和辩理的能力。”<sup>[13]</sup>惠特曼对城市的崇尚是以基督教的仁爱做基础,他只是借城市生活和人们的感受来表现他对爱的笃信,惠特曼认为:“科学,在根除古老的陈腐之谈和迷信之后,正在为诗歌、为一切艺术,甚至为传奇故事开拓出一片百倍宽敞而奇妙的蕴藏着新的性能的园地。”<sup>[14]</sup>其中,“新的性能”之一就是爱的笃信,也是这类诗歌的核心,郭沫若在理解的时候,偏重于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相结合,没有偏重感悟这种相对于其雄阔诗风更为本质的基督教信条。史记先生在论述惠特曼诗歌对郭沫若诗歌创作影响的时候,没有指出两者城市观的本质区别。

郭沫若借鉴惠特曼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描绘手法,在《女神》《星空》《笔立山头展望》《少年维特之烦恼》《雪朝》《演奏会上》《我是个偶像崇拜者》《新阳关三叠》《匪徒颂》《胜利的死》《地震》等诗歌中,诗人只是吸收了先进的科学元素,加入了“汽车、飞机、X 光线、谐振、燃点”等城市中的景物,这些诗歌体现出郭沫若认为作为力量化身的城市是国富民强的重要标志,能不断推动工业化进程的速度,也表现出现代人在城市生活中的生活体验和情感意识。在写给好友宗白华的信中,郭沫若这样表述:“我们既赞扬希腊文明,同时又不能忘情于我国固有的传统,则科学文明当然不能加以蔑视,我辈肯定人生,则当于积极进取的动态中以求生之充实。我国固有的传统精神亦正示授我们一个生活的指标,从希腊文明递演出的科学精神亦正是我辈青年所当深深吸吮而以自为营养的一种资料。科学虽不是充实人生的一个全圆,但它是这个全圆的一扇重要的弧面;他决

心一方面要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又要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我们要在我们这个新时代里制造一个普遍的明了的意识:我们要乘着个动的进取的同时是超然物外的坚决精神,一直向真理猛进!”<sup>[15]</sup>郭沫若和田汉乘坐火车到太宰府观光游玩,他都不忘记录现代化交通工具所引发的心绪情感。他在信中这样描述:“火车在青翠的田畴中急行,好像这个勇猛沈毅的少年向着希望弥漫的前途努力奋迈的一般。飞!飞!一切青翠的生命,灿烂的光波在我们眼前飞舞。飞!飞!飞!我融化在这个磅礴雄浑的 Rhythm 中了!我同火车全体,大自然全体,完全合而为一的!”<sup>[16]</sup>郭沫若及时捕捉到现代科学文明带来的全新的现代感觉和新的人生体验,用火车飞驰的短促和快速的节奏把自己坐火车的兴奋和激动之情写入诗中。郭沫若看中的是城市中的科技能加快中国社会进步的速度和推动民族现代化的进程的社会效用,他把对科学精神的提倡、工业发展的要求放在构建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宏大框架中。

表面看上去惠特曼和郭沫若诗歌中表达的城市观没有两样,但前者事实是用基督教爱的视角为底色,这是发展科技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惠特曼没有用功利化的衡量标准来凝视城市生活,否则诗人不仅对城市生活的本真面貌和价值意义的探索做浅尝辄止的表面性的理解,还有可能拘泥于狭隘的个体情感,导致诗人对现代意识、现代情绪和现代体验的放逐,于潜意识中遮蔽城市文明所呈现的独特的现代美感。惠特曼呼吁,人们要用爱的目光和爱的情怀看待城市,以爱的视角而非利的视角看待现代人的生活感受和内心状态,惠特曼提出的城市背后人们之间的爱不仅仅在为现代美国城市居民回归心灵天堂提供了一个具体的道路,还在于为现代美国公民的道德超越提供了精神导向和终极关怀。

郭沫若有意识地模仿惠特曼的诗作,典型的的就是雄浑辽阔的排比气势,在他看来,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和科学指导下机械化进程息息相关,机器昼夜不分地轰鸣工作是为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诗人由衷地发出赞美机械科技文明对社会发展起到的积极作用,把自己对科学的感觉和印象与对祖国新生的急切欢快的渴望联系在一起,并在诗中的字里行间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然而,郭沫若重点在于描写城市的科技之力对当下现实的启发,没有侧重于体现出惠特曼诗歌中城市生活背后对个体精神的追寻尤其是对爱的追求和礼赞,对于他的爱的哲学则没有推开大门,而这点被史记先生所忽视。依靠基督教的爱的体悟和高度的人文关怀来获得深刻的精神境界是惠特曼诗歌的特征,他们就像隐在诗歌背后的神,以神之眼透过诗歌发射出博爱的光芒。

### 三、郭沫若对惠特曼爱情诗歌的误读

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在《文艺思潮论》中视自然、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为惠特曼诗歌的三大主题:“以自然(Nature)、人道(Humanity)、民主主义(Democracy)见称的美国诗人惠特曼(Whitman),其谢世以后,世论尚之。至最近数年,益风靡西欧文坛者。以他的思想,系以灵肉调和为根本,极大胆地赞叹肉体

之美的原故”。<sup>[17]</sup>厨川白村犀利地指出惠特曼对灵肉关系的正确处理是现代社会的特征,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把身体欲望当成令人鄙俗的原罪,普遍以理性排斥身体直觉、情感欲望等所谓非理性因素,对灵魂的至高无上的强调而使得感性肉身作为罪孽受到贬低和排斥。惠特曼的心灵导师爱默生延续了这种思想,他从二元论出发,认为精神、思维、灵魂远远高于肉体,惠特曼试图通过对肉体的崇尚来消解爱默生的此种观点,肉体是身体最重要的一面,惠特曼认为“假使有任何东西是圣洁的,人类的肉体便是圣洁的,一个男子的光荣和甘美,便是未被污损的男性的标志,在男人或女人身上,一个洁净、健强而坚实的肉体,比最美丽的面孔更美丽。”<sup>[18]</sup>所以,惠特曼反对自己的导师爱默生的观点,即爱默生认为肉体极大地阻碍了灵魂的纯化和净化,提倡用思想文化的发展来排斥和贬低肉体。鉴于健康强大的肉体能带来生命活力和生命强力以克服颓唐脆弱的国民心理,惠特曼把现代性爱作为加速打造国民个性的催化剂,把“释欲”原则作为充分释放国民个性的关键。同时他把矛头指向西方宗教神学体系和清教禁欲制度,殖民时期的英国主流意识形态和后来的清教教义对美国人性的钳制和压抑是多角度的,尤其是性爱方面,清教徒对性是非常禁忌的,为了有力掌控弱势群体的思想动态和行为实践,性成为最高阶级进行独裁统治的工具之一。清教徒的性禁忌成为合法性的这一不合乎人性的标志早已在被统治者的灵魂深处镂刻下深深的烙印。作为人类文化传统和私人生活中极为隐私的领域,传统诗人很少有勇气书写凸显个性释放的诗歌。在惠特曼看来,人是欲望者,身体欲望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和建构的最直接的表现,必须正确对待身体的欲望释放,源自于身体的欲望、冲动、本能、情感不能被内省、反思、评价等所取代,因为纯粹的心灵自我或无心的肉身自我是不存在的,人应该是情感、直觉、反思、欲望、冲动等精神自我和肉体自我的统一。

而若培养出个性蓬勃的美国人,不仅意味着社会体制的全面革新,更重要的要能促进国民主体价值观的彻底转变。考察当时美国民众的文化心理现实,惠特曼发现由于殖民文化教义和清教文化思潮对人们自然欲望禁锢的越是长久深厚,国民个体的潜能就越难挖掘、实现和释放,禁欲不可能造就刚健洒脱、敢作敢为的生命个体,只能造就羞惭软弱、唯唯诺诺的个人。因此,要使得美国人的个性从传统理念的阴影中解脱出来,以“灵肉一致”的性爱原则对国民意识进行改造和重塑是不可缺少的,若缺乏对以“灵肉一致”为前提的性爱原则这种深层价值秩序的探索和建立,从身体到灵魂都完整自由的美国个人主体性的建立是不可能横空出世的。

他追求的健康自然的“灵肉一致”的性爱观念和现代道德意识相吻合,惠特曼对自己诗歌的定位是:“我让《草叶集》的问世,去唤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心中那不绝的生命之流,并使之高涨,永远激荡着他们的爱和友情直接向我奔来,对于这个强烈而不可抑制的渴望(它无疑或多或少地潜伏在大多数人类灵魂的深处)——这种从未满足过的对于同情的欲望,以及给别人以同情的无边



胸怀——这种普遍的民主的伙伴的爱——这种古老、永恒而又常新的适当的象征着美国的爱的交流——我想在那部诗集中已经毫不掩饰地、公然地给予了表达。”<sup>[19]</sup>郭沫若在《女神》序言中提出：“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你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把他们的心弦拨动，把他们的智光点燃。”<sup>[20]</sup>郭沫若诗歌中提倡的现代意义上的灵肉一致的爱情排除了功名利禄、门第高下等封建传统道德一切外在因素的束缚，其写作宗旨和惠特曼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通过对情感的肯定和歌颂来对抗禁欲主义的包裹。然而，若仔细审视和考察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却发现他并没有偏重于真正深入了解惠特曼的“灵肉一致”的性爱观。

惠特曼从人的欲望为切入点来激发人的生命本能和生命强力，他认为，性爱的满足是一切理智活动的原始动力，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本能欲求之一。他不遗余力地呼吁欲望的释放以便促使人从麻木不仁、呆滞愚钝的心理惯性中解放出来，使国民感受到性爱的勃发、生命的冲动、思想的灵动、情感的恣意、欲望的燃烧，使国民个体生命处于全面打开、澄澈透明的状态，如果原欲是火，在惠特曼这里，就是熊熊燃烧的欲望的大火，是源源不断、生生不息地持续存在的生命旺火，而不是一丝火星，一束火把，不是放在火炬中的小面积的可以度量的火。马克思曾这样表达过：“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的控制。”<sup>[21]</sup>

惠特曼把性欲视为人类社会繁衍的重要助力，而灵和肉一致的结合在他心中是最完善、最神圣、最崇高的，现代性爱的存在和发展不仅仅是关涉国民个体本能欲望得到满足的问题，而且还是一种作为美国国民个性建立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惠特曼以“灵肉一致”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性爱的提倡和追求，并不仅仅清除美国文化心理结构中传统因素中的肉体是鄙俗不堪的、灵魂是神圣不朽的、智慧高贵的思想理念，同时还伴有对国民的深层价值秩序结构进行大胆改造的重大意义。惠特曼诗歌中性爱话语的构建正是从现代性爱中获得灵感，为当时如何塑造充满个性的美国人找到一个突破口，通过性道德这个极有刺激性和感召力的话题，把当时社会的目光聚焦在他们的切身体验上，使得民众由这种体验感得知个性精神的可贵，个性自由的观念广为流传。

而这种以“灵肉一致”为基础的个性解放还伴有对国民的深层价值秩序结构进行大胆改造的重大意义的性爱观在郭沫若的诗歌中是罕见的，虽然郭沫若的此类诗歌中有惠特曼诗歌的影子，但对他们的形而上的意义，却有了一定的曲解。惠特曼的灵肉一致的现代性爱话语在诗集《向那花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此诗根据《圣经》中《失乐园》的情节线索开展，深刻地折射出美国民众普遍对性爱禁锢的强烈不满和坚定抵抗，惠特曼想要让读者感受到，社会之所以能够得到延续和传承就是因为原始的生命欲望不断地发挥效用，惠特曼认为基督教传统中的原罪不是十恶不赦、天地不容的罪行，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之后赤身裸体的性爱生活是非常纯洁美好的。他指出：“那种禁止欣赏大自然最奇妙的创

作——人体结构和形态的崇高美的行为，纯粹是讨厌的假正经，而乐园中的夏娃和亚当倒没有什么可怕之处。”<sup>[22]</sup>诗人认为他们被压抑的欲望得到了最大的缓解与释放，这样他们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吹响人类欲望解放的宏阔之音，而他们的后裔曲解了自然法则，将性爱看成可耻的勾当是极其错误和荒谬的。

惠特曼的诗歌既不局限于对肉体的推崇，也不拘泥于对精神的褒奖。他强烈反对灵魂和肉体割裂的反逻辑的二元论，而认为人的肉体 and 灵魂一样崇高神圣，提倡完整的灵肉一致观，因此，他塑造出具有健康的体魄和纯洁灵魂的活生生的生命个体，构建出深邃而有活力的新的性道德的诗学境界，因为若对个体性欲的描写一旦成为诗歌创作的滥觞，那么作品的性爱描写远远不会丰富而又深邃、博大而又辽远、厚实而又崇高。所以，只有把灵与肉融为一体的诗歌创作才可能具有恒久的审美生命力，才是人区别于动物活动的关键所在。惠特曼的诗歌通过人的深层价值秩序的改造来达到赋予现代人们鲜明个性的目标，有力地反抗历史上漫长的贬低和歧视身体、遏制和控制灵魂的文学传统，施展美国个体的“灵肉一致”的性爱权利逐渐挺进人性的深度自由。这种走向人性深度自由特征是此类诗歌的核心，而这种特质在郭沫若的诗中是罕有的。

宗白华在《恋爱诗的问题》中指出：“向来一个民族将兴时代和建设时代的文学，大半是乐观的，向前的。有惠特曼雄放无前的伟大乐观，所以也有了美洲人少年勇进的建设气象。法国颓废派的文学不足以振兴法兰西的民气，而罗曼罗兰的乐观文学于将来法国，将来的欧洲，必定有好的影响，所以我极私心祈祷中国有许多乐观雄丽的诗歌出来，引我们泥涂中可怜的民族入于一种愉快舒畅的精神界。从这种愉快乐观的精神界里，才能养成向前的勇气和建设的能力呢！”<sup>[23]</sup>在人性低迷、激情消弭、思想萎靡的时代，虽然郭沫若模仿惠特曼的充满激情的感性冲动、能引人们到惬意爽快的境界的诗歌，但是内涵有本质区别。

郭沫若的《Venus》诗中有“灵肉一致”的主要观念，诗人写给自己心中的象征 Venus 的恋爱女神时，把爱人的嘴比作酒杯，能把他灌醉，沉醉于靠在她乳房的欢愉当中。虽然这些爱情高歌者、爱情追索者、爱情沉溺者的艺术形象和行为感染过郭沫若，但是他不可能如惠特曼那样用高蹈的浪漫激情，毫无顾忌、堂而皇之、正大光明地描写圣洁的爱情，诗歌只是以形象表达出郭沫若对灵肉的一般理解，他虽然被惠特曼的“灵肉一致”的性爱描绘所震撼，甚至从个人心底发出由衷地赞美，但他很少在自己创作的艺术作品中大量描述人对官能之爱的沉溺，最多是在某些细节提到。值得一提的是，郭沫若曾经翻译惠特曼的《从那滚滚大洋的群众里》的译诗，并把译诗发表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原诗的标题是“Out of the Rolling Ocean, the Crowd”，标题为“从滚滚的人海中”，原诗是首表现感情真挚的情诗，而郭沫若却翻译成鼓动人们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而不断奋斗的诗歌。

郭沫若是吸吮传统的乳汁长大，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观念已经内化为他的心理积淀，所以受到传统力量和传统心理的限制和影响，他笔下不可能出现如惠特

曼那样对性爱细致描绘的诗歌。由于本土语境的制约,在灵与肉发生冲突矛盾时,他后期的诗歌侧重把生命内部的灵肉冲突转换为外在的社会现实和人生理想的冲突,这种性爱描写往往有更为强大的社会性主题,抗战爆发后,他忽视了欲望可以转换为革命的动力,而使得革命抗战的话语成为社会主导话语,极大地压抑“灵肉一致”的爱情诗歌的出现。也就是说,从此角度切入人的发现,展现人的生命强力的诗歌作品服从于以民族救亡的宏大局面,对性爱的细致描写的诗歌极为少见,这种本土语境构成强大的力量遏制诗人对“灵肉一致”的性爱的细腻描写。史记先生在论文中指出了郭沫若在惠特曼的影响下创作的爱情诗歌,但是他鲜有注意到两者爱情观的区别。郭沫若诗歌罕有惠特曼诗歌中主人公对爱情的坦率表白,罕有惠特曼对女性美的大胆欣赏以及对爱之欢愉的细致描绘,罕有对爱情自由追求的抒情主人公以背离和抗拒传统伦理规范的态度在坠入爱河的同时使得生命得以全面敞开,以达到身心自由的境界。

郭沫若在学习和借鉴惠特曼诗歌精神的时候,鉴赏和吸收了惠特曼诗歌气势宏大的表面形式,他创作出来的诗歌只是以形象来表达自己对惠特曼诗歌精神的理解,没有侧重体悟惠特曼诗中神秘的超验的层面,特别是惠特曼诗歌的平民观背后的泛神论、城市观背后的仁爱论、灵肉一致观背后的对国民的深层价值秩序结构改正的意义,他的诗歌没有上帝、神性、对博爱、对彼岸世界的守望等形而上的信仰作为支撑。对此,史记先生在其论文中没有提及。

郭沫若借鉴惠特曼的诗风来扩展了诗歌话语资源,开拓了诗学视野,丰富了文学想象的审美环境和诗情空间,而惠特曼诗歌的博爱、悲悯的宗教精神和向上的意志等哲学特征却没有被郭沫若所深入借鉴,故当时代主题和时代呼吁发生了变化,他的诗歌创作立即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向,投入到为政治生涯服务中去。

### 注释:

- [1] 史记:《论“五四”时期惠特曼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求索》2012年第4期,第169页。
- [2] [荷兰]斯宾诺沙:《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232页。
- [3] [5][8][9][10][11][12][14][18][19][22] 惠特曼:《草叶集》,楚图南、李野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60、159、1174、21、236、27、236、1237、185、1124、10页。
- [4] 李野光:《惠特曼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1页。
- [6][20] 郭沫若:《郭沫若诗选》,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26、1页。
- [7] 郭沫若:《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吴宏聪等编:《创造社资料》(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3页。
- [13] [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34页。
- [15] 郭沫若:《郭沫若书信集》(上),黄淳浩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89页。
- [16]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122页。
- [17] 田汉:《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少年中国》1919年第1卷第1期。
- [21]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2页。
- [23] 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24页。

[责任编辑:李本红]